

· 专家视点 ·

## 国民性的塑造：教育与分工

刘旭东

**[摘要]** 分工是人类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体现了劳动方式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强有力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厘清分工在对人的发展、国民性的形成过程中的双重影响，对于更加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分工以及其所带来的种种效应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有助于深化对如何改善和提升国民性的品质、抵御生产机构内部分工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认识。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在努力地适应分工的同时，有力量以自身特有的功能抵御分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由此塑造出张弛有度、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国民性格。但也要认识到，教育是分工影响的放大器，它可能会不自觉地被分工所操控。为此，教育要能够自觉地反思自己的功能。

**[关键词]** 国民性；分工；教育

**[作者简介]** 刘旭东，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兰州，730070）

### 一、国民性及其塑造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就提到“国民性”这一概念，与此同时，麦克多高（McDougall）也曾论述过种族与遗传因素对于民族精神的重大影响。一般认为，这是有关“国民性”的较早论述。

“国民性”是一个颇有歧义的概念。1934年，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文化模式》中提出文化决定人格，人格则是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在她看来，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模式，都有其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不论是人的本性还是群体行为，都通过特定的文化模式的奖惩机制使处于同一文化模式下的不同个人在行为、观念、情感等方面形成某种共同性，因此，人是塑造于特定的文化模式的。在20世纪30年代末，林顿（R. Linton）和卡丁纳（A. Karkiner）提出“基本人格结构”概念，深化了对国民性的认识。所谓“基本人格结构”，是指一个社会成员因共同的早期养育和训练而具有的共同人格结构。他们认为，即使在同一文化下，也存在不同的人格。由于文化的共同性或共通性，不同人格之间必然存在性格特征、价

值观、行为方式、情感模式的相似性。这一部分相同的人格既是不同人格的“基本人格结构”部分，又表征着国民性。这就意味着，讨论国民性并不能忽略文化中每个个体本有的差异性，国民性其实是差异中的共同性。1944年，杜波依斯（Cora DuBois）出版《阿罗人》，提出“众趋人格”概念，用以替代“基本人格结构”。她试图借助现代统计学从各种人格类型的分布中找出国民性，即在国民成员中找出趋于众数的那些相对持久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她在研究中发现，尽管一个社会中个体的人格有非常大的差异，但当把这些不同人格进行统计分析后会发现，有些人格会显示出具有一定的中心趋势，即“众趋人格”。后来，“众趋人格”概念逐渐发展为“民族性”或“国民性”的概念。因此，“众趋人格”概念的提出表明国民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使有关国民性的研究摆脱了一味主观描述的境地而步入了实证化的研究道路，同时也为我们得以深刻地分析国民性问题提供了支持。

一般认为，国民性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的、持

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它涉及到人的价值观念、普遍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它塑造于文化，并且与文化相一致，具有发展变化性。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中成长并生活于其中的，都必然拥有特定文化所赋予的品格。但这种品格的获得过程及其作用的展现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动态变化发展的，是可以通过人的积极主动的影响和干预而趋向于人们所期待的方向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时代，特别是不同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必然塑造出不同的国民性。要改造国民性，使之趋于人们所期待的发展方向，就要在其中渗入相关要素，使之得以发生变化。

国民性是一个变化发展着的概念。在国民性的形成和发展中，它必然要受到诸如自然地理环境、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由于这些因素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内在交互关联性，决定了国民性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然而，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同时代的国民性具有不同的特征，表明不同时代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对于国民性有更为重要的影响。英国的弗农·马林森（Veriron Mallison）对法国哲学家富依列（Fouillee）提出的在研究不同族群的行为时要着重研究其物理环境（Physical surrounding）与社会状况的观点持赞同意见，把影响国民性形成的主要因素归纳为遗传、环境、社会传统和教育四个方面，并分别从地理、经济、历史、宗教、政治与社会影响这几个角度进行具体阐述。此外，他认为技术影响贯穿于国民性形成的所有领域，并对经济与政治所产生的影响予以了特别关注。

## 二、分工及其对国民性的影响

分工是人类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作为对于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客观力量，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早已被人们所认识。

柏拉图认为，社会分工是提升人的能力使之朝专业化方向发展的有效手段，对促进社会福利有积极意义。在他看来，人适合于从事各种类型的工作，但其禀性、才能是有限且有区别的，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把事情做好并取得成效。他说：“只要有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使每种东西

生产得又多又好。”<sup>[1]</sup>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消极影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谈到两个人的观点。一是舒尔茨在《生产劳动》中指出：“工厂工人的死亡率较高尤其表明了这种分工的弊病……人们借助于机器来劳动和人们作为机器来劳动，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sup>[2]</sup>二是萨伊指出：“分工可以增加社会产品、社会威力和社会享受，但是它剥夺、降低每一单个人的能力。”<sup>[3]</sup>在这个问题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他们认为，社会分工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现象，由社会分工造成的劳动活动的局限性是人畸形发展的根本原因。傅立叶认为，分工破坏了人的本性和体力、智力的全面发展。欧文认为，由于分工的原因，现代人同他所发展到的高度相比，只不过是一小块残缺不全的碎片而已。

亚当·斯密对分工的论述在讨论分工理论发展史中是难以绕过去的，他对此有精深的体认。他认为，社会分工能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并进一步提高工人的熟练程度、节约时间和促进机器的发明和应用，究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sup>[4]</sup>

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协作形式，它强有力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体现了劳动方式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这是它的价值所在，但是其中也潜伏着可能的负面影响。丹尼尔·贝尔从纯生产的角度把社会历史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这种划分有超阶级的痕迹，虽然未能充分揭示除生产力之外的其它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由于其与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与生产力发展的大体情形相近，得到了广泛的认同。<sup>[5]</sup>依此理论，从分工发展的历史看，自从进入到文明社会以后，人类社会至今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农耕时代和工业化时代（权且不论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因为后工业也是工业化的一部分）。这两个时代的分工有非常显著的差异，由此对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其中所富含的不同文化对不

同时代国民性的影响也大相径庭。

在野蛮的狩猎和游牧社会，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决定了每个人都必须为生存而勤奋工作，同时，相对而言，他们每个人为了生存的需要必须拥有尽可能多的劳动经验和生产生活技能，而不能过于专门化，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紧密地依靠氏族的力量生存下来，不至于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被淘汰。此时的职业分化极为有限，即使存在所谓的分工，它也只是原始意义的自然分工。简陋的分工表明每个人在生产的过程中不需进行高深的理智思考与逻辑判断，每个人的个人能力的发展还具有明显的趋同化色彩，还未能把不同的才智凝结为一个力量更为强大的共同资源，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还只是在较低的层面上实现的，其心智的能力的发展水平还十分有限。在农业社会，尽管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社会分工，而且特定的社会关系对于此时分工的影响极为显著，但总的来说，此时的社会分工还十分有限，且较为粗糙，由此塑造了具有农业时代特征的国民性。

而到了工业化时代，分工有了大的发展，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与沟通变得更加频繁和紧密，以往那种每个人都是多面手，对更广泛的事物具有浓厚兴趣的状况，逐渐被由于产品、职业以及生产与交易活动花样繁多而使人囿于一隅的局面所取代。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以往那种在每个人的生活半径中都可以涉猎的丰富的生活和劳动领域被无形地压缩和窄化了。出于效率的缘故，每个人的生产活动范围变得十分有限，生产劳动过程单调重复，个人多方面的志趣爱好被遏止。甚至出现了在工艺中技能娴熟或在某个领域中有精深的造诣，在“很小的事情上面知道得很多”<sup>[6]</sup>，但对除此之外的事物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现象。孔德在谈及社会分工对人的影响时曾指出：“大多数学者只知道鼓励地思考问题，把自己局限在既定科学或大或小的领域里，他们已经顾及不到自己特殊的研究和普遍的实证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sup>[7]</sup>他尖锐地指出，现代社会里人受分工制约而被局限在一个极为有限，视野狭窄的空间的窘境，无法对自身的特殊性做出准确的判断。

上述内容表明，分工对人的影响是显著的，它塑造了不同时代人的不同性格，也塑造了不同行

业者的不同性格。由于分工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同时也与特定的文化密切相关，成为影响国民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常，分工被分为社会分工和生产机构内部分工（亦称旧式分工）。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对劳动的划分，它的出现和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体现的是人的价值。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社会分工必然是不断分化的趋势，这本身亦是驱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对于社会分工，人们多持肯定和褒扬的态度，对其分化和发展乐观其成。生产机构内部分工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出现的分工形式。它把完整的劳动操作细分，让一定种类的劳动者从属于这种细分的操作，它是对人的再划分。这种划分破坏了人的完整性，给国民性格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sup>[8]</sup>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它扼制了人的本质力量，使其难以充分展现，人失去了实现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第二，它使人的意识、观念、精神畸形发展，人的精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被限制，人的才能无法得到充分展现。第三，这种分工造成不同文化圈中的人的闭关自守状态，限制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束缚了人的全面发展，使历史成为局部的历史。第四，这种分工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线性化、虚幻化，使人失去了使其才能得以全面发展的手段。第五，这种分工使生产和生活失去了自主活动的性质，它们成为外在于人的异己的社会力量。此外，这种分工使个人终身附属在一种活动上，使人极为丰富的智力和体力以及潜能、志趣、天赋、需要、爱好等都无以获得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总之，生产机构内部分工培养了目光短浅、能力有限、性格偏执、个人本位、缺乏与他人沟通与合作能力的国民，这样的人是缺乏多方面的兴趣和才华的一群忙忙碌碌的赶路人，他们的存在使传统文化在此被突然中断、分崩离析。

厘清两类分工及其对人的发展、国民性的形成的不同影响，对于更加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分工及其所带来的种种效应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和提升国民性的品质，抵御生产机构内部分工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 三、教育与分工

自从进入到文明社会后，教育就是社会生

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随着体制化社会的日趋完善，教育不仅成为体制的一个重要构件，也成为了维护和实现体制目标与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和途径。因此，讨论国民性的塑造与改造，不能不讨论教育。

在农耕时代，社会分工形式较为简单和粗放，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笃信“智慧来源于过去”，由此决定了社会变迁的缓慢性和分工的简单粗放。在这种背景下，人的发展还未完全服从分工，教育在总体上将自身的职责定位在“传道授业解惑”，它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博雅色彩，它还未完全成为体制的附庸，功利性色彩还比较淡薄，个人的志趣、爱好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这就培育了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向往崇高、理想、充满激情、具有正义感的国民性格。当然，也正如前文所述，较之于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在理智性、思维的深刻性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这个时代的教育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其时代特征。在教育内容上，无论中外，莫不以历史典籍或宗教教义作为主体，尤以中国古代为甚。在教育方法上，形成了以讲授记诵为主、强调灌输的方法体系，农耕社会时代的人所具有的性格特征莫不与此有关。

工业化时代，教育与分工以及国民性的形成间仍然具有密切联系，其对国民性的影响更加显著。这种影响在总体上表现为教育被生产机构内部分工所导向，倾心于培养能够直接满足生产过程各种品质需求的劳动者。这是具有鲜明工业化色彩的教育活动方式，它的目标直接指向以培养能够直接控制和操作流水线的操作工。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资本主义学校教育不断拷贝着其社会关系，它对应了经济活动中的职业分层。例如，有些学校就特别强调培养学生服从与守纪律的品格。不同的学校培养了学生不同的性格，由此也决定了他们将来在职业生涯中的处境。<sup>[9]</sup>因此，此阶段国民性及其培养是以生产需要为直接依据的。这种以生产为依归的文化价值观对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不甚关注，在教育内容上，强调所谓的实用性、可操作性，程序化、套路化、具有可检测性的知识受到青睐。这样的教育具有鲜明的社会本位色彩，它对国民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营造了专业主义取向的

社会氛围，各个领域的专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极大的程度上左右着社会生活。他们精于一艺，塑造了个性鲜明、崇尚实务、理性独立的国民性，这是被英格尔斯视为现代人所拥有的性格特征。<sup>[10]</sup>在分工的驱动下，教育以服务生产为导向、以培养能为市场所容纳的人为己任，在不经意间塑造了众趋人格。另一方面，这样的分工往往与某种特定的体制相配合，加上民族文化传统的因素，它很容易培养出视野和知识领域很有限、缺乏文化底蕴和感悟反思能力、目光短浅、充满市侩气息的人，甚至出现了在某个小问题上知道的很多、但在更大的方面知之甚少的，知识与人生断裂的人。

分工是造成工业化社会中国民性出现两极性的根本原因。在涂尔干看来，分工是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增加而导致的生存竞争不断加剧的结果。在此，他流露出了两个维度的看法，一是从进化和积极的角度来讨论问题，把分工视为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增加而产生的现象；二是从进化的角度，认为这是竞争所需。他的这个观点表明，分工的存在和演进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人的发展是在分工的框架下实现的，要实现人的和谐发展，就要有合理的社会分工的支持。但是，每个人得以步入社会生活是通过接受教育实现的，教育在人的发展与分工间扮演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为此，教育要在改造国民性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独到的功用，就要有意识地影响和干预分工，有效地抵御分工可能对人的发展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教育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活动，它在努力地适应分工的同时，以自身特有的功能抵御分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由此塑造出张弛有度、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国民性格。然而，工业化时代的教育未能充分展现出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它成为固化分工弊端的工具，表现在其目的、内容、方法、手段、途径、评价等方面。在此，教育是分工的影响的放大器，同时它可能会不自觉地被分工所操控。

#### 四、教育要适应并促进分工，同时有效抵御分工的负面影响

人们通常认为，国民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长期以来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共同性的民族气质或性格，这个认识本身没有问题，但

不能忽略分工在其中的作用。分工和国民性一样,具有时代性、历史性和民族性。无论经济活动如何变化,不同国家、民族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分工必然有差异,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既有生产活动、经济发展水平本身方面的,也有特定的文化传统、观念意识等方面的。而无论何种原因,这种差异必然会影响到特定国家、民族的国民性格。

英格尔斯认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们是现代人的,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sup>[1]</sup>人的现代化包括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情感欲求、知识才能、人格结构、社会化培育模式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和全面更新,这也是国民性改造的努力方向。国民性的塑造既深受分工的影响,也与教育密切相关。要改造国民性,就既要充分地顾及分工所带来的影响,也要充分认识到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一方面,作为必然要进入到社会结构中的每个人来说,他必须顺应分工的需要,掌握与之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也要具备与其身份相一致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教育在其中发挥着微妙且极为重要的调节作用,培养着国民的性格,以使其得以更好地生存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要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分工中潜藏的危险因素,有意识地抵御其可能给人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有可能塑造出的缺乏文化底蕴急功近利的国民性,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对国民性的改造与提升。

在现代社会,亚当·斯密曾预言的教育要普及化,要成为塑造现代人国民性的基础性的方式与途径已成为现实。教育在塑造现代人国民性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要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教育要密切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相关联,表现为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要与之相适应,所培养的人应当具有与特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素质,能够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深层次的影响,它在传授知识、培养技能的过程中,通过

诸如潜在课程这样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和塑造着国民性。而这一层面则是需要教育进行深入反思和自省的,只有自觉地认识到其中可能存在的二律背反性,深入地挖掘这一层面的内容,对于通过教育有效地抵御分工对人的发展和国民性的塑造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有意义的。

人所做的一切都必然受某种动机所支配。人是有意识的存在,也是知识的存在,没有任何动机支配的行为在人身上是找不到案例的。而作为主观心理现象的动机,并非是空穴来风,必然要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为此,要考察人的行为,就必须考察其背后的动机以及影响这个动机的诸多外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当要对人的行为做出解释时,最后的根据就是他生长于其中的时代以及所受到的各种影响。每个人做事都有这样一个前提,他是否能够澄清自己的内在感受和动机,直接决定着他的行为是否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自由。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清醒地去反思和澄清自身的内在感受和动机,相反,在许多情形下,或者缺乏反思能力,或者受控于简单的从众心理,人往往会不加质疑地默认既有的前提并依此行事,把当下的分工作为解释自己行为的依据。然而,任何分工都不是恒定不变的,它本身都具有内在的变化性,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不间断的变革,其中也必然具有双刃剑的特征。这使得分工有天然的局限性,有可能会束缚人的发展。所以,尽管当下的分工能够成为人们行为一时的依据,但其固有的局限性却使得其不能成为人们行动的最后根据。如果以此为依据去行动,就如同上文多次指出的那样,人会不自觉地被分工所控制,就可能塑造出与人的本性相背离的国民性。为此,认真审视这个前提,澄清其价值是有重要意义的。

培养现代人的文化批判意识,是抵御分工的负面影响、塑造理想的国民性的基础性条件。文化批判意识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只有拥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才能具有宽广的眼界和有效抵御急功近利的生活态度和倾向。文化是人文精神的载体和基石,人文精神是文化的灵魂。如果没有文化,塑造和培养文化批判意识犹如无源之水;如果没有人文精神作为内涵,也就谈不上文化批判意识。文化批判意识与人文精神密切相关,要培养文化批判意识,就

必须提升人的文化素养，只有提升人的文化素养才能确立其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具有超越意识，看到分工的局限性，不受其摆布。不同的文化知识属于不同的价值体系，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标准，它不仅超越个体，也超越个别时代和个别知识。只有通过学习不同的文化才能了解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而促成每个人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思想观点和情感态度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对分工有清晰的把握。在当今文化多元的时代，使每个现代人了解更多的文化及其价值体系是形成既与社会历史发展趋势合拍，又能彰显个人特征的社会文化的重要条件。唯有如此，人对于分工现象才能有清晰准确的认识和把握，才能认识到分工中存在的弊端，进而在服从和适应分工的同时又能够为自身的发展考虑，在分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意识到自己可能的发展趋势。

培养现代人的感悟反思能力，是有效地抵御分工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重要内在机制。现代社会的分工虽然十分复杂严密，显得更具有理性色彩，但它仍无以成为解释人的行为的终极标准，人的行为的终极标准必须指向人的和谐发展。作为社会化的存在，人不能摆脱特定时代的分工的制约和影响，而且由于分工力量的强大，还必须服从于它。在这个过程中，分工的力量很可能不由自主地转化为人得以存在的依靠和依据。这种状况是令人忧虑的，它可能会剥夺人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和能力，在被设计的框架中无以自拔。在这种情形下，培养人的价值体验能力就显得极为重要。人是社会化的存在，他必需依赖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和交流而形成的文化纽带才能生活在世界上，分工就是这个纽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服从并适应分工是个人得以存在于特定社会的先决条件，对它的适应和遵从也是人得以社会化的主要内容。在其作用下，社会生活及生产活动得以在一定的框架内有序地进行，也使人在改造世界和自身的过程中得以不断地把与一定的分工相一致的社会文化和规范濡化到自己身

上，进而实现自身的成长，如同斯普朗格所说的是将客观文化转化为主观文化、进而使人得以被“唤醒”的过程，由此某种特定的国民性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塑造。在这种情形下，需要培养人的反思感悟能力，准确地把握体制化社会对教育的制约性和教育对超越体制束缚的重要作用，不能把分工的作用恒定化，不能把分工看作是我们行事的最后依据，还必须对其进行追问。分工的力量主要是以理性化、逻辑化的外显形式展现出来的，而隐蔽在其后的则是人类的价值观、理想和情感、态度等。由于后者必须附着在一定的载体上才能显露出来，在服从和适应分工的同时，需要用心去捕捉、感悟和体验社会文化及其中所隐含的人文精神。只有如此，才能遏制分工的负面影响而使之变成活的、有灵性、能够使人发展的更好的精神力量。

#### 参考文献：

- [1]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60.
- [2][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8,146.
- [4]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4.
- [5]李定仁,刘旭东.教学评价的世纪反思与前瞻[J].教育研究.2001,(2):44-49.
- [6][英]贡布里希:理想与黄昏[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190.
- [7]盛宏涛.杜尔凯姆的社会分工思想与教育功能的异化[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7,(8):66-70.
- [8]韩庆祥.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J].江淮论坛.1988,(5):60-65.
- [9] S. Bowles & H.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n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un Paul, 1976.7-8.22, Chapter 4,13.*
- [10]周晓虹.理解国民性:一种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兼评英克尔斯的《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J].天津社会科学.2012,(5):49-55.
- [11]阿力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69.

(下转第14页)

[J].教育发展研究,2009,(22):9-13

[6] 吴晓求、宋东霞、李艳丽、刘庭竹.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基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成效的调研[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5):6-10.

[7] 黄恒学主编.分类推进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183

[8] 张祖纲等.建立人事分类管理制度:深化高校人事制度改革[J].北京教育(高教版),2003,(5):18-19.

[9] [10]徐刚.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正向激励的路径依赖[J].中国行政管理,2010,(3):32-36.

[11] 新闻中心-中国网.绩效工资改革:“铁饭碗”变“瓷饭碗”? [EB / OL]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9-09/14/content\_18520028.htm,2009-09-14.

[12] 鲁洁.超越性的存在——兼析病态适应的教育[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4):6-11,29.

[13] 邓晓芒.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J].社会科学论坛,2011,(7):114-122.

[14] 钱理群:北京大学正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EB / OL]http://topic.weibo.com/culture/23117.

[15] 吴康宁.不自尊的大学没资格培养创新人才[N].中国青年报,2013-01-17(3).

[16] 鲁迅.两地书之八[A].鲁迅全集[C].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1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486

[18] 钱理群.生命至上:灾难中的精神资源——震灾中的思考之一[N].文学报,2008-6-5(4).

[19] [20] 姜义华.中国国民性问题析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1):25-36.

### Remold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Route about the Reformational Dilemma of Public Institutions

Wang Jin

**Abstract:** As a type of public institutions, the reform of university organizations is in dire straits, which is caused by the compartmental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ranks between university organizations, the complex structure of internal interest that would be unchangeable by the university system reform of human resources. Besides, merit pay reform of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can't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centive function. Historically, to solve the reformational dilemma of public institutions, we should give scope to the transcendent function of educa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mechanism that education shows an adverse effect to the society. In this process, to remol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is a pragmatic gripper.

**Key words:** national character, the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public institu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责任编辑:刘志文]

(上接第7页)

### Shap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and Work Division

Liu Xudo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is currently i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 rich diversity. Work division which is the existent form of human labor, reflects a progression from a lower to a more advanced stage and effectively changes the way people live. However, some opposite forces may lurk inside it.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valu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to understand various effects of work division to clear up the double-planedness. Meanwhile, it also contributes to know how to improve national quality and resist negative effects originated from the internal division of productive facility. Education i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It accommodates the division while withstanding adverse impacts with its own special function. Eventually, it shapes brave, aggressive and optim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ity. Nevertheless, people should recognize that education is the amplifier of divisions, which may be manipulated by it involuntarily. So education should rethink its own function consciously.

**Key word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ork division, education

[责任编辑:刘志文]